

一 官宦门第

徐世昌字十五，号菊人，又名彊斋、水行邨人、石门山人、彊斋主人、东海居士等，于 1855 年 10 月 20 日（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）出生于河南卫辉府城内曹营街寓室（另说出生于天津）。徐家祖居浙江鄞县西南乡绕湖桥，崇祯年间随始祖徐钟麟迁到河南，从此在河南开封安家立业。在开封府，徐家倒也声名显赫，因徐氏子孙屡进官阶，为当地百姓所侧目；二世祖徐孙森，康熙十九年选山东长清县知县，从此累叶科第仕宦，名著声绩；三世祖徐学渊，字长源，赘天津张氏，自河南分支天津，自立门户，使徐家有了浙江、河南、直隶三地籍贯之说；祖父徐思穆，字笔珊，一字质夫，历官河南中河通判，候补直隶州知州，补用知府，赏戴花翎，诰授朝议大夫。妣陈氏，累赠一品夫人；其父徐嘉贤，字少珊，太学生，为国学生候补主簿，累赠光禄大

夫，振威将军。妣黎氏、刘氏，累封一品夫人。

徐世昌出生时，高祖母朱太夫人仍健在，老人家喜见徐氏添丁进口，非常高兴，当即替徐世昌命名增福，以示喜庆与祝愿。伯曾祖兰生公认为此名流于俗气，不利日后成就大事业，等徐世昌稍大时，改名为十五，这以后便一直沿用。徐世昌长至 3 岁时，其弟徐世光于 1857 年 4 月出生，徐世光字友梅、更生，道名贞惠。兄弟俩相继问世，确实给徐家带来了欢声笑语，等到兄弟稍长，他们便开始接受严格的教育，以副官宦门庭。

19 世纪中叶，中国正值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，内忧外患，使古老的封建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，中华民族面临灾难深重的生存危机，徐世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生的。咸丰三年（1853 年），太平军建都南京，义军所到之处，人民纷起响应，反清起义不断，清朝统治者为了继续维护腐朽的封建政权，对太平天国起义实行严厉镇压。就在这一年，徐世昌的祖父徐思穆随清廷督师大臣讷尔经额办理粮草，治军于河南怀庆。当时广西太平军已攻入河北，形势极为严峻，徐思穆率其子徐嘉贤亲自督战，在千里黄河岸边与太平军交战。徐嘉贤作战有勇有谋，他针对太平军枪炮射程不远的劣势，结竹筏渡河，群起而上。他当时年仅 17 岁，正是好勇斗狠的年龄。由于太平军武器落后，初入北方时军心不稳，只得败退，徐思穆父子大获全胜。在这场战役中徐嘉贤曾单骑闯入太平军营中侦察，受到讷尔经额的高度赞赏，称其将来必定前途无可限量。只可惜他在 25 岁上大病不起，撒手西归，徐家由此中落。

徐嘉贤的继配刘夫人也是名门闺秀，她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家刘大魁的女儿，正应了封建时代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。刘夫人是从家学，旌表节孝，恪守中国传统的妇道，既勤俭持家，又相夫

教子，家境虽不宽裕，但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，不稍宽暇。她特地聘请名师教授徐世昌兄弟，可谓不遗余力。刘夫人每天都要督促检查孩子的学习情况，他们从私塾放学回家，仍要温习功课。兄弟俩学习有进步时，她会很高兴，如无长进，则马上送回私塾，请老师严加责罚。在徐世昌兄弟眼中，慈母实比父亲更严！

刘夫人望子成龙心切，她不顾家境日贫，屋漏粮尽，却要典钗当物，为徐世昌延请最好的老师。徐世昌生性聪颖过人，4岁时便在开封双龙巷开蒙，6岁时入私塾读书，师从当地颇有名望的王介卿先生学习，接受严格的孔孟道德教育。徐世昌正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坚实的根基。

徐世昌7岁时，父亲徐嘉贤不幸病逝，从此家境败落，尽管徐家生计日显艰难，但刘夫人对徐家兄弟的教育一刻也没有放松。随着徐世昌年岁渐长，刘夫人先后聘请祥符常鹤亭孝廉、祥符张荆璞拔贡、江苏李厚籽秀才教习。刘夫人不仅督课非常严格，寒夜每每不寐，与此同时，她还注重培养子女的优良品德，在学业之余还讲一些家道盛衰及古今忠孝的故事，勉励他们成才。刘夫人常常对徐世昌说：“居家必先忍让，报国不避艰险。要像你们的父亲那样尽忠尽孝，少有高志，英果严毅。只可惜他为人不苟言笑，虽至亲无私语，郁郁以终。其所以振家声绍先业者，惟尔等是望”。将振兴徐氏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儿辈身上。刘夫人的谆谆教诲，使徐世昌发愤学习，一则报答母恩，二则光耀徐门，并逐渐形成他日后为人处世，从政立业的独特品质。

刘夫人特别留心在细小事情上对徐世昌兄弟进行教育。徐世昌小时，若有三份食物，每人也只能取一份。一次，徐世昌想得到其中的两份，便遭到母亲的严厉斥责，刘夫人说：“汝等今日

即如此，以后当如何呢？”她宁可将另一份食物扔掉也不让孩子们吃，以免养成贪利忘义的恶习，徐世昌对这件事印象很深。

徐世昌兄弟渐渐长大，交往的圈子也越来越大，刘夫人非常注意他们交往的对象，若交贤德之士，刘夫人便热情款待，关怀备至，否则立予斥绝，断其往来。以致当徐世昌、徐世光为官时，刘夫人还常常询问与其交往的朋好，刘夫人希望子女“跟着好人学好人”，走好人生每一步，可谓用心良苦。徐氏兄弟正是在严母如此的教导下，不仅学业日进，而且以德会友，知交甚广，为日后成就大业奠定了基础。

1864年，当徐世昌10岁时，祖父徐思穆因病过世，使本已艰难的徐家雪上加霜。1866年，徐世昌的曾叔祖徐士醇出任鄱陵知县，有意接济刘夫人母子，提出“全眷移往依之”，以便就近照应。但是，刘夫人“力持不可”，她认为“托人余荫，罔知艰苦，无复有刻厉振兴之日”，过于优越的环境难以磨练坚韧不拔的意志，不利于子女的成长，便婉言谢绝了。为此，徐士醇感慨良多，他对刘夫人说：“汝苦心持家教子，异日必有成就，真我家功臣也。”^①极为钦佩。

1868年，14岁的徐世昌，因为“大雨弥月，屋漏粮尽，书屋墙圯，辍读数月”。不久，他又在表叔陈仲英家设馆援读，指导小表弟们读书。徐世昌16岁那年，三叔有事外出，他奉长辈之命管理家务，经营薪水。他一面苦读，一面为生计奔忙，过着封建时代贫寒士子的艰难生活，正是由于少年磨难，才形成了日后徐世昌处乱不惊的儒雅风度。

由于徐世昌自小接受严格的私塾训练，基本功扎实，外加刘

^① 《徐世昌年谱》卷上，《近代史资料》总第69号，第6页

夫人的悉心督导，写得一手均匀有致、行款周密的小楷，颇有气势，深得祖叔父的器重。从此，徐世昌有机会走出家门，跟随叔祖父到沁阳、太康、淮宁等县，给县令充当幕府、治理文案或为家馆老师，每年挣得几十两银子补贴家用，以供养家糊口。

1873 年，19 岁的徐世昌到其祖父的好友张秩卿太守家治函札兼会计等事务，弟弟徐世光也随到他家读书。这一时期是少年徐世昌十分活跃的阶段，他出入官场，以文会友，遍访中州各地贤士名流，与他们切磋文章，交流心得，共商时事，眼界大为开阔。他曾在开封大梁、游梁两个书院多年，结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，如潘鼎甫、谢仲琴、王五美、孙景崧、倪宽夫等，这些都是徐世昌读书、立身、涉世的益友，都对徐世昌的成长产生过一定影响。

徐世昌携徐世光游学在外，对其关怀备至，处处体现出长子为父的爱心。兄弟二人相互尊重，相互促进，终于同科中举，一时传为士林佳话。

二 双桂承欢

1882 年，28 岁的徐世昌与其弟徐世光入京应顺天乡试，得中第一百五十四名，徐世光得中第七十五名，徐氏兄弟双双同榜中举，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，远近亲朋好友纷纷前来贺喜，项城人袁世凯特地送来一方巨匾，足有 1 米高 2 米长，上书“双桂

承欢”四个大字。

袁世凯借助祖、父辈的余荫，有钱有势，原想通过科举之途以求飞黄腾达，无奈两次应试举人不第，只得放弃科举取仕之途，于 1880 年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，充当一名小小的营务处会办，自此步入官场。

1878 年，袁世凯闲居陈州，过着诗酒文人生活，浪迹于文人雅士之列。中州历来人杰地灵，英才辈出，陈州一带更是文人聚集之所，他们往往济济一堂，谈古论今，吟诗作赋，极尽风流，袁世凯以其出身名门大姓，又以乐善好施而声名远播。袁世凯好作诗文但又不守绳墨，引经据典但不求甚解，其诗不谙平仄，不合体例，其桀傲不驯的气质跃然纸上。

1879 年 3 月，四川人李颢候大令署淮宁县知事，特约徐世昌至署治理文牍。徐世昌一日闲暇无事，便到袁家园中走走，当时袁世凯正在园中亭下读书，徐世昌无所顾忌，径直走入园中，袁世凯连忙起身相迎，四目相对，双方颇为惊奇，等到坐下纵论时务时，更是相互仰慕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，这样一来二住，交际日深，终于结成金兰之好。徐世昌长袁世凯 4 岁，所以袁世凯总对他以兄相称。

徐、袁陈州结义，一文一武，相得益彰，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刚柔相济、义利权衡的正剧，他们各自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坎坷人生道路，对民初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外交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袁世凯非常尊重徐世昌的学识，每每言谈，他都对徐世昌高深的城府，渊博的学问，精辟的见地大为钦佩，觉得徐世昌远非腐儒可比，必有鲲鹏展翅之日，袁世凯曾多次对家人说：“菊人，妙才也”！徐世昌与袁世凯结成莫逆之交后，对袁世凯有了更深

的了解，在他眼中，袁世凯决非武人凡夫，平常年代也许难显山水，如逢乱世当为枭雄也不可知，少年能有远大抱负，也正符合徐世昌的处世之道，因此对袁世凯十分看重。在随后长达 30 年的宦海生涯中，徐、袁二人互相提携，既为知心的朋友，又为亲密的谋士。

徐世昌未仕时，家道中落，靠当塾师和在洛阳、安阳、扶沟、淮宁一带办理文案为生，仅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，他与徐世光曾想一同入京应试，只可惜囊中羞涩，无法后程，这成了徐世昌心头一病。素以轻财仗义而著称的袁世凯了解到此中隐情后，当即慷慨解囊相助，惠赠纹银 100 两作为川资，供徐世昌兄弟北上应试，以壮其行色。徐世昌、徐世光在袁世凯的资助下，果然两试连捷，1882 年徐氏兄弟二人同榜中举，4 年后又中进士，授为翰林院编修，终于圆了徐氏兄弟科举梦。

徐世昌在进京川资有了着落后，便安心备考，在行色匆匆之余，不忘到前门外琉璃厂吕祖庙抽上一签，卜问科举前程。徐世昌在吕祖像前虔诚地跪下，忐忑不安地从竹筒中抽出一支签，上面写着“光前裕后，昌大其门庭”几个大字，他当时虽弄不明白其中的玄奥，但听人说这算得上是上签，自然很吉利，兄弟俩都非常高兴。等到发榜那天，徐世昌中式第一百五十四名举人，徐世光中式第七十五名。兄弟俩中世光名次靠前，世昌列后，但都同时得中。这不正应了签上“光前”二字？兄弟同中举人，不正正是“昌大其门庭”？从此，徐世昌对吕祖迷信不已，奉为终生膜拜的偶像。

徐家苦尽甘来，最高兴的莫过于含辛茹苦操持全家的刘夫人。当徐世昌、徐世光高榜得中、荣归故里时，刘夫人不忘用俭朴的筵席款待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，她一面张罗来宾，一面亲自

开列菜单。

这时，神采飞扬的徐世昌、徐世光兄弟不住地与来宾打着招呼。忽然街尾人声嘈杂，一哨人马飞奔而来，原来是袁世凯前来庆贺。袁世凯下马后，远远拱手高喊：“两位仁兄，才气不凡，今日得中红榜，小弟特来恭贺。”他语音未落，随从们抬出一方巨匾，上书“双桂承欢”四个大字，正是当时名士路渔宾先生亲手所书。徐氏兄弟迎上前去，三人亲切地问长问短，好不开心。袁大公子的到来，给宴会平添几分热闹，人们在羡慕徐氏兄弟的同时，也暗暗赞赏袁世凯急人所难的义举，如果没有袁世凯的全力资助，徐氏兄弟的梦想要得以实现，不免要多费一番周折的。但人们不会想到数年后袁世凯与徐世昌会成为一对政治上的好搭档。

徐世昌在家稍作休整后，于第二年再度入京应礼部会试，虽然落第，但初尝科举甜头的徐世昌，更加用功苦读，搜览群书，以致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。他每天攻读《资治通鉴》、《近思录》、《朱子全书》、《求阙斋弟子记》等书，除此之外，他还饶有兴趣地读一些“志异”、“怪谈”之类的闲书，以广博见闻。他爱读时文小品，剖析世间现象，了解社会民情，为他日后跻身政坛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。徐世昌虚怀若谷，谦冲自收，博闻强识，尤其爱听、爱读、爱写，自诩“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”。

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32岁的徐世昌再次与徐世光赴京应礼部会试，得中第一百七十六名进士，徐世光未第。保和殿复试，朝考一等，殿试二甲，于是授以翰林院庶吉士。这次同科进士者还有：陈夔龙、杨士骧、吴庆坻、冯煦、张元奇、宋伯鲁、柯劭忞、宋育仁等，他们都是晚清名士。该科主考大臣是光绪帝的恩师，户部尚书翁同龢。徐世昌从不放弃一切结友机会，他用

心结纳同榜进士和翁公，极力为他日后从政铺平道路。

三年考满，徐世昌于 1889 年授职翰林院编修，此时李鸿藻是翰林院掌院学士，张之洞为东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他们都是徐世昌的师长。所谓“编修”只是一个七品京官，俸银很少，正因为如此，徐世昌对老师的奉敬，仅能送 2 两银子，其生活之清苦，俸银之微薄可想而知。

为了改变生活处境，徐世昌曾想到让两位堂叔帮忙找一份俸禄高的官差。他分别致信湖北钟祥县知县嘉禾堂叔和江西德安知县嘉霖堂叔，帮他外放州县官。俗话说“县官不如现管”，外放官俸薪的“含金量”高，不致于在京城受穷。徐世昌的这一想法遭到堂叔们的反对，他们认为，京官虽苦，但接近上层，易于升迁，只要耐心等待，当有出头之日，力劝徐世昌稍安勿躁，潜心修炼。自此，徐世昌不再提外放一事，在京居闲 9 年，任国史馆协修、武英殿协修之类无名无利的差事。然而，正是这 9 年的苦心经营，奠定了徐世昌日后成就大业的坚实基础。

三 初涉政坛

近代中国多灾多难，列强纷纷染指，甲午中日战争便是惨痛的一幕。1894 年 7 月 1 日，中日战起，但清军无应战准备。清廷上下对蕞尔日本竟敢来犯感到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，强烈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，但是清军实力难以与日抗衡，这一点李

鸿章十分清楚。李鸿章自 1874 年日本侵台时，就主张以日本为主要敌手，力图扩充海军，但从 1888 年开始，海军经费就被挪用用来修建颐和园，作西太后晚年休憩游乐之所，海军从此即未添置新舰。就在中国甲午之战爆发前 6 个月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请求改装铁甲船镇远与定远上的大炮，需耗银 61.3 万两，可是海军衙门一文不名。中日战争爆发前夕，李鸿章亲自主持海军大检阅，发现中国海军无一艘新舰，心知决非日人对手。

7 月 1 日，中日双方同日宣战后，李鸿章派四路大军抵达平壤，然而战争结果是清廷陆军大败于平壤，海军受挫于大东沟，清朝的海陆大军已彻底崩溃，使清廷无以为战，不得不以和了之，为此清廷下一谕旨，责成李鸿章前往马关与日本订立城下之盟。

当时朝野上下对中日战争献计献策，京津地区的王公大臣纷纷谋划救亡图存良策。1894 年 9 月，徐世昌以翰林资格联络新科状元张謇及梁士诒等人共商国是，认为在民族存亡之际，当重新启用恭亲王奕訢，显露出对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不满。与此同时，徐世昌又同张百熙、李文田为首，召集 57 人在松筠庵集会，合疏奏请奕訢秉政，并寄以厚望。不久，由于中日战事吃紧，徐世昌又与张謇领衔合疏弹劾李鸿章，指责其备战不力。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，再加上李鸿藻、荣禄等人均对李鸿章不满，使奕訢顺利地出任管理总署事务、会办军务大臣。

徐世昌对大局洞察明晰，力陈救亡方策，他单衔具奏，请掌院代陈，力主张之洞咨询大计，并与待读文廷式领衔 37 人上《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折》，以作为今救亡大计。徐世昌在奏折中写道：

近闻倭人将以倾国之兵，尽出黄海。此时李鸿章已暮气沉沉，其所调集的将兵，或为新募，或不成军。况且听说倭人所用的军械船只，多由西贡拨来，那么他借力于法人，已是众所周知，共见共闻。彼既已私与他国合力谋我，我怎能以一国独受攻击呢？当前的形势是：倭人得志，势必对英国不利；法人参与兵事，为德国所忌。所以听说英国人颇有借机与倭人开衅的想法，其兵船五十余艘，已尽集结南海。德国人也待我特厚，其将士在中国效力的，德主奖赏有加。只任中国随意购买军火，借资御敌。臣等愚以为，应借此机会特派亲信重臣，与其商议，提出兵费给他们，使其出兵伐倭，与其议和而被迫赔款，何如战胜用于犒赏三军？得失分明，无庸置疑。^①

徐世昌等人的外交思想仍与李鸿章“以夷制夷”无二。李鸿章当时应付国际局势的策略便是“以夷制夷”，他想借助俄国对付日本，因为俄国对朝鲜也有兴趣，不愿看到日本独占其利，因此，李鸿章曾通过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透出信息，希望帝俄出面干涉，或由帝俄出面联合英美法意各国共同制止日本的野心。然而俄国不愿过早插手中日事务，只表示“以友谊劝日本撤兵，不能相强”，使李鸿章“以夷制夷”的外交路线破产了。

1895年2月，清廷正式向日本求和，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。李鸿章亲赴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、外相陆奥宗光举行会谈。在谈判中，李鸿章虽据理力争，但败国无外

^①故宫博物院编：《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》，“奏折篇”，第21卷，第24—25页

交，最终签署了中日《马关条约》，其主要内容是“（一）朝鲜独立；（二）割辽东半岛、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；（三）中国赔偿给日本军费二万万两；（四）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从事商业工艺制造；（五）凡西洋各国在中国所获的特权，日本均得享受。”《马关条约》的签署，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，这是日本对西方在华利益的公然侵犯。当初俄国无意制止日本侵华，只想友谊劝告日本，而如今条约使它受害最大，俄国一直将辽东半岛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，现在却落入日本人之手，怎肯善罢干休，于是俄国出面联合法国、德国，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中国，但仍由清政府出银 3000 万两作为交换条件。

甲午中国战败，表明清政府积贫积弱已久，正如李鸿章所言，“十年以来，文娛武嬉，酿成此变。平日讲求武备，辄以辅张糜费为言，至以购械购船悉为厉禁。一旦有事，明知兵力不敌，而淆于群哄，轻于一掷，遂致益发不可收拾。”战争失败也促使清廷朝野的觉醒，一时朝廷命官交章进奏者不乏其人，为救亡图存献计献策。当时徐世昌也积极奏言：

朝鲜之患不自今日始矣。倭人久蓄窥伺之心，从容布置于十数年之前，中国晏然而不加备。迄事变一朝猝至，盖不待兵绥相交，而胜败之数固可豫决矣。……观内外诸臣可与决不计者，莫如湖北总督张之洞，其虑事之周，任事之勇，求之今日，已罕其匹。而其大过人者，尤有两事：一曰用人，一曰理财。至其讲求西法，熟精洋务，尤为西洋各国所推服。①

①徐世昌：《退耕堂政书》，第 12 页

张之洞与徐世昌同属晚清清流派，他以“深明时务”、“举办洋务”、“兴学变法”堪称清流派中流砥柱，徐世昌极为看重张之洞的实业救国的政绩，他历任山西巡抚、两广总督、湖广总督，创办军工、民用企业，兴办新式学堂，废科举兴西学，一时名震朝野。尤其当《马关条约》签约的消息传来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在北京发起维新变法运动，倡言变法、鼓吹改革时，张之洞也表示大力支持。这一切使徐世昌感到张之洞是目前收拾残局的干将、能吏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同时，张之洞也急呈己见，认为，“时事日急，万难姑安，吁请修备储才，急图补救，以支危局。条陈九事：募洋将、练陆军、治海军、造铁路、开学堂、讲商务、求工政、派游历、备巡率”，^①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见解。

徐世昌力主起用张之洞与奕訢，很明显是反对以慈禧、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势力。徐世昌身居翰林，迫切希望出仕任职，他在甲午战后民族危亡之际急切上言，从中可见爱国热忱之一斑。在民族多难之秋，徐世昌不甘沉默，他于 1898 年 9 月，与张翼之、于晦若、文芸阁、梁启超、汪大燮、沈子培、英人李提摩太、美人李佳白、毕得格议设“强学会”，又名译书局，他还特邀袁世凯一同加入，袁世凯当即捐银 500 两以示支持。此举可视为康、梁改革派与徐、袁稳健派之间最初的联系。同时，徐世昌移居粉房琉璃街，与康有为住所很近，二人常常议论时政，互为唱和，关系日亲。自此，徐世昌与袁世凯开始在清廷高层崭露头角，顺利地步入政坛。

^①张之洞：《普无忠愤录序》，第 3—4 页

四 助袁小站练兵

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的 50 多年间，清王朝的腐朽与没落日益显露，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，内有农民起义的反抗与打击，为了维护日趋腐朽的封建统治，清廷逐渐认识到改制军队的重要性。清代军队以八旗、绿营为国家的经制兵，兼用各地防军，到咸丰、同治年间又崛起湘淮军，成为清王朝足以为靠的汉族地主武装。甲午中日战争中，旧式清军一败涂地，使清廷认识到满人军队不堪一击，汉人武装潜力巨大，清朝的陆海军面对蕞尔日本一触即溃，清廷有识之士认识到，要救亡首先要在军事上整军经武，采用西法练兵，在政治上要变法图强，除旧更新。他们纷纷指出：“维今日事势，练兵为第一大政，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著”。^①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从“埋首书城，磨穿铁砚”的书斋中走出来，一时弃文习武的风气蒸蒸日上，这给屡试不第的袁世凯带来新的希望。

袁世凯于 1880 年投效义父吴长庆，当上营务处会办，从此便与武场结缘。1882 年，他又随吴长庆赴朝鲜，深得淮系首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，吴长庆死后，李鸿章便派袁世凯接统庆字营。1885 年，袁世凯升任“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

^① 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兵十八，第 9656 页

务”的驻朝全权代表，并兼办外交事务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袁世凯应调回国，随直隶臬司周馥办理东征转运事宜。

甲午战争后，清政府决定创办新建陆军，袁世凯弄到一个浙江温处道的官职，充“督办军务处”差委，留在北京。1894年冬，清政府命淮军官僚，长芦盐运使胡燏芬，在离天津东南70里的新农镇（天津、大沽之间的小站），练“定武军”10营4750人，聘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，“一切搏练章程，均按照西法办理。”^①1895年，清廷调胡燏芬督办津芦铁路，小站练兵交由袁世凯接统，继续训练。胡燏芬的10营中，步兵3000，炮兵1000，马队250，工程队500，袁世凯接手后，扩充步兵2000，马队250，共7000人，改名为“新建陆军”。这样，“北洋则有新建军，南洋则有自强军，是为（清朝）创练新军之始。”^②

“新建陆军”不同于湘淮与绿营等旧式军队，它不仅全用西方新式军械装备，仿照西方洋操，并且仿效西方征兵制度与管理体制。总部有督练处，袁世凯总任督练，下设参谋、执法、督操等营务处，以徐世昌、王英楷、梁华殿分任三处总办。另外，袁世凯还委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，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领，王士珍为工程学堂总办兼工兵统带。王、段、冯三人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主要骨干，分获“龙”、“虎”、“狗”三个绰号，并称为“北洋三杰”。

1897年8月，就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第二个夏天，从官道上走过来一队身着戎装的北洋新军官兵，他们簇拥着一位年届而立之年的人放马而行。此人身着青藏色的朝服，头戴五品翰林正

① 《光绪朝东华录》第3556页

② 《清朝文献通考》（二）卷二〇三·兵二

冠，庄严稳重。他就是由袁世凯特意“奏调”而来任“总理本军参谋营务处”的参赞徐世昌。

营务处参赞相当于北洋新建陆军的总参谋长，他可以“考阅各学堂文卷、考核兵目操法、校订行军攻守阵式图说、改订讲训各兵官功课、自习英文”，其地位之重，可以想见。袁世凯还给了徐世昌一个“谘谋”的名义，即当袁氏不在军营时徐可以代行处理军务，这样在北洋新军中，袁是一号首领，徐是二号首领，但实际上军营之事，拿主意者多为徐世昌。从北洋系的兴衰史中可以发现，徐世昌不仅总揽了北洋上奏下达的全部文书，而且在团结内部，联络官场和协调人际关系中左右逢源。徐世昌不仅忙于内政、外交，发展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事业，而且从事近代军事理论的翻译与研究，参与小站练兵的方方面面，在各重大事宜上运筹帷幄，是袁世凯不可或缺的左右手。

1897年9月，徐世昌由天津航海至上海，换乘江轮往汉口，入武昌，居住在四叔父江夏县署。在此期间，徐世昌大开眼界，他有机会遍阅武昌的编布厂、缫丝厂、银元局、铁厂、枪炮厂、武备学堂、自强学堂及黄鹤楼、晴川阁、琴台诸名胜，亲身感受到西洋近代文明的神奇和祖国山河的美丽，更坚定了他走出书斋报效祖国的决心。他常与四叔父秉灯夜谈，“所言挽回大局之要为变科举，立学堂，多设报馆，广开铁路，而尤主士农工商兵，即西人征兵之制也。又详论中西学术及西政、西学之分，而痛恨词章帖括之束缚人才。”^①当时张之洞想挽留徐世昌，徐世昌婉言谢绝，于年底又回小站新营，协助袁世凯。他“每日治牍外，阅各种操法，演试各种新炮，考校各学堂，仍乘间看书，研求戒

^① 《徐世昌年谱》卷上，第20页

略”，孜孜不倦。

袁世凯仅以“拔贡生”的低微身份被任命为北洋“练兵大臣”，而徐世昌竟然以五品翰林弃文修武，自愿降格屈从袁幕，在荒僻的天津小站安营扎寨，似乎有悖常理。他宁可追随袁世凯，而不愿接受名位远在袁氏之上的张之洞的挽留，徐世昌自有其道理。在徐世昌看来，自己能有今日，全仗当年袁世凯鼎力相助，知恩图报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另外在近代中国，已逐渐形成“内轻外重”“尾大不掉”“督抚专政”的政治局面，京官不如外官发达得快，文官不如武官来得红火，眼前的事实表现，曾国藩湘系集团、李鸿章淮系集团由控制地方政权到左右中央政局。袁世凯既出身淮系，又得李鸿章的知遇之恩，如果就此建立一支与湘、淮皆有渊源，又超然两派之上的新式集团，无疑也会主宰中国未来的政局，“北洋派”便是最合适的选择。史实证明，袁世凯从小站练兵起家，后来北洋的许多头面人物，大多在小站时跟随袁世凯，所以北洋嫡系又有“小站系”之称。小站系事实上构成了后来北洋武装政治集团的班底。

徐世昌认为，“论文则谓立身必先有守乃能有为，因推论中兴诸名臣（指‘同治中兴’，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诸名将），谓能师营，葛者必有功于世。”^①徐世昌顿悟出要成就事业，必须要在政治与军事一体的征途上展现自己的才华，抓住成功的机遇，以军功而获得仕途光明才是他屈尊小站的真正动机。

徐世昌看到，近代中国汉族地主新兴势力如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的湘淮势力，对近代社会产生了空前的冲击。湘淮

① 《徐世昌年谱》卷上，第20页